



前郭尔罗斯文史

纪念郭前旗大同会 成立六十周年文集

张德臣 主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



前郭尔罗斯文史

纪念郭前旗大同会 成立六十周年文集

张德臣 主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

© 张德臣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纪念郭前旗大同会成立六十周年文集 / 张德臣主编.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7. 2

(前郭尔罗斯文史)

ISBN 978-7-80722-377-1

I. 纪… II. 张… III. 革命回忆录—作品集—
中国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18587号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沈阳市第三印刷厂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5\frac{5}{8}$

字 数: 150千字

印 数: 1—1000

出版时间: 2007年2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包 辉

封面设计: 杜 江

责任校对: 徐 力

定 价: 10.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347

邮购热线: 024—23284335

E-mail: ln mz@mail.lnpgc.com.cn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纪念郭前旗大同会成立六十周年文集》编委会

主 任/阿汝汗

副主任/呼和少布

成 员/张德臣 恩 和 苏赫巴鲁 伯颜杜仍

主 编/张德臣

撰 稿/刘健民 黎晓初 高万宝扎布 那达那

高士哲 厚 和 苏赫巴鲁 伯颜杜仍

包淑贤 包景文 包海龙 尼 玛

吉任台 巴拉吉 拉西嘎拉僧 胡格吉乐图

整 理/张欣勇

版 权/政协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序

中共前郭县委书记 阿汝汗

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郭尔罗斯前旗大同会成立60周年。为此，前郭县委、县政府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内蒙古自治区等地的部分原前旗大同会会员参加了这次活动。

郭前旗大同会酝酿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成立于“八一五”光复之后。当时郭前旗的一批蒙古族进步青年，在外地求学期间，因受到进步教师的影响和接触一些进步书刊，开始觉醒，萌发了追求蒙古民族解放和振兴的思想。他们在中共地下党员刘健民的支持和引导下，将追求蒙古民族解放和振兴的思想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坚定地走上了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道路。他们成立大同会、招兵组建革命军、改造伪治安队；参加地方政权建设和清算反霸斗争，支援内蒙古地区的开辟工作；参加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围困长春和辽沈战役……一路走来，经历了枪林弹雨、血雨腥风，经受住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立下了赫赫战功，留下了闪光的足迹。

1940年，郭前旗的蒙古族青年包彦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行列。如果他是郭前旗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先行者，

那么大同会会员们就是后来人。之后，郭尔罗斯又有几千名的各族儿女，在郭前旗党组织的号召下，汇入解放战争的滚滚洪流之中。据县志载，仅到1949年，郭前旗就有五百多人为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此后，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无数的前郭尔罗斯人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在继续着烈士们未竟的事业，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国防建设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乃至生命，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和英雄人物，他们以实际行动，在继承和发扬先辈们光荣的革命传统。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天我们回忆那段历史，总结那个时期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同会会员由青年学生锻炼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多数人成为我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他们的成长历程，是郭前旗蒙汉各族人民觉醒的过程，是蒙古族自己解放自己的过程，是蒙汉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过程，是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并打败反动势力的过程。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在郭前旗这个以蒙古族为主体，多民族共存的地区，关内来的我党部队和干部，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动员和发动蒙汉各族群众，培养蒙古族干部，帮助建立民族武装，团结民族上层进步人士，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孤立了少数反动分子。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断发展了我党在郭前旗的力量，最终以弱胜强，取得了郭前旗革命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的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前郭尔罗斯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光照耀耀下，全县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如今又在党的富民政策的指引下，

全面落实我县“十一五”规划的各项任务，向全面建设小康县的奋斗目标稳步推进。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我们回顾和总结郭前旗大同会的历史经验，就是要全县各族干部群众，不要忘记大同会会员，更不要忘记那些牺牲的烈士们，继承前辈的革命传统，发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开拓进取，锐意创新，为自治县的美好明天贡献力量。

目 录

- 1 我与郭前旗大同会 刘健民
- 3 蒙古骑兵团在战斗中成长 黎晓初
- 18 关于对大同会几个历史问题的定位 高万宝扎布
- 24 堪载史册的岁月 那达那
- 27 蒙古骑兵团的后勤工作 高士哲
- 32 郭前旗大同会的起源 苏赫巴鲁
- 37 对大同会之我见 伯颜杜仍
- 40 弘扬大同会精神 为全面建设小康县而奋斗 包淑贤
- 51 庆祝郭尔罗斯前旗大同会成立六十周年 包景文
- 60 回顾和总结郭前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历史经验
..... 包海龙
- 71 心灵的探索
——郭前旗大同会成立六十周年座谈会发言 尼玛
- 79 纪念郭前旗大同会成立六十周年 吉任台
- 83 评大同会的纲领 巴拉吉
- 87 缅怀乌勒吉布彦 巴拉吉

- 96 大同会带我走上革命路 拉西嘎拉僧
- 100 我的革命历程 胡格吉乐图
- 104 弘扬大同会精神
——写在参加大同会成立六十周年庆祝活动之后
..... 高万宝扎布
- 115 忆述郭前旗代表出席“五一大会”
..... 高万宝扎布 厚和 包景文
- 128 永远的丰碑
——缅怀敬爱的刘健民同志 包淑贤
- 135 松花江畔旌旗红 包淑贤
- 148 闪光的足迹
——在《从松花江畔到内蒙古草原》首发式上的发言
..... 包淑贤
- 155 铁血丹心傲苍穹
——记骑兵战斗英雄包海龙 包淑贤
- 173 后记

我与郭前旗大同会

□ 刘健民

我是1932年由家乡扶余到北京读书的。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参加了抗日救亡学潮，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国共两党的性质和政策很清楚，国民党拱手出卖东北，媚外攘内，主张先消灭共产党再去打日本侵略者。共产党一贯主张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一致对外，赶走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当时，我国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同国民党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大敌当前，只要赶走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才有希望。而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不仅不让东北军抗日，反而把其调到西北去打内战，因而爆发了“双十二”事变。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出于爱国之心，我也到敌后，在南阳参加了南阳县委，担任游击队长。纪德贵组织柳河沟煤矿工人暴动，他任支队长，我任二大队教导员。后调到八路军总部通讯营任教导员。八路军成立情报处后，左权任处长，我就在情报处工作。后来到第一军分区任情报站站长。

1943年，组织上派我回东北，在沈阳设个情报站，负责联系东北抗联，架设电台，了解敌情。但经过一年多的时间，通过各种渠道，也未与抗联接上关系，于是在1944年由东北回到太行山根据地。到总部汇报工作后，又返回东北，任务是发动群众，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回东北后，我在郭前旗组织了朝鲜农民协会和蒙古族大同会。当时，日伪敌特活动很猖獗。老百姓对

日伪政权虽恨之入骨，也想驱除日寇，但绝大多数敢怒而不敢言，一时不好发动。1944年冬，我以协和会会员身份先到新庙站，后来又 to 吉拉吐协和会做会计工作。在这里先是深入到朝鲜族群众中去，再是同一些蒙古族知识青年接触谈心。这样，我就逐渐地认识了高万宝扎布、拉西道尔吉等蒙古族青年。他们思想进步，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族的兴衰存亡。我曾向他们介绍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国内抗日战争形势，提出日本即将垮台，我们怎么办和走什么路的问题。旨在让他们关心国是。还和他们谈了“双十二”事变，国民党不抗日，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等问题。讲了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讲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共产党将建立多民族一律平等的国家。他们很尊重我，很相信我说的话。经过酝酿，他们提出成立大同会的主张，对此，我表示赞同。大同会建立后，我给他们提出的任务是，发展组织，掌握敌人动向，组织武装力量。上级党组织当时给我的任务是，就地开展革命工作。我当时活动范围是在长岭、怀德、乾安、扶余、郭前旗一带。扶余是我家乡，工作时间较长，没有问题；郭前旗大同会也是在我的主持下成立的。国民党占领长春后，他们的杂牌军到处乱窜，郭前旗为什么能保护下来，群众发动得好，基础牢靠，这是与大同会这个蒙古族进步青年组织有直接关系的。

大同会成立后，我就调到长春去了，虽然再没有直接帮助他们工作，但一直有联系，长春市党工委通过赵东黎同志指导过大同会活动。后来我党派大批干部先后来到扶余、郭前旗工作，这个时期有很多领导干部与大同会有联系。1945年光复以后，我担任吉长武装部队司令员，傅根深同志担任政治委员。由于我军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声誉，所以，有我们支持大同会，在当时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这不论是对大同会，还是对整个郭前旗的革命阵线，都是十分有利的。

蒙古骑兵团在战斗中成长

□黎晓初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北这块宝地成了国共两党激烈争夺的焦点。东北不仅是沃野千里的北国粮仓，交通发达，工业基础雄厚的钢铁、能源、机械、黄金生产基地，而且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北靠苏联，西接蒙古，东南与朝鲜毗邻，西南与华北平原接壤。

国民党不仅通过海、陆、空向东北运送8个军27万军队，还收罗重用日伪残余势力，宪兵、汉奸、警察、恶霸地主武装以及土匪等，与共产党争夺大东北。

对此，我们党中央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派遣10万大军，2万多干部火速进军东北。

我和田铁军是从太行山太岳日夜兼程到东北来的。时值隆冬季节，风吹到脸上像刀子割似的，大地被冻出一道一道裂子。走到怀德时，灰蒙蒙的天空飞舞着冰冷的雪花，我们的身上落满了雪，眉毛、胡子上也挂满了霜。找到郭峰，接上关系后，他便带着我们坐着一辆破汽车来到了郭前旗。

一进郭前旗，治安队站在路两旁，都拿着枪逼视着。我们从他们中间穿过去，他们没有难为我们，我们也没有理睬他们。

郭前旗到扶余虽然只有十余里路，中间却隔着宽阔湍急的松花江。此时江面上灰蒙蒙的一片，寒气逼人，江边一丛丛柳条在瑟瑟的寒风中抖动着。我们沿着封冻的冰道到了扶余。

郭峰同志说：“你们看到这个形势了吗？”我们说：“看到了，他们拿枪逼视着我们，这是些什么人？不像日本人，也听不懂他们说的话。”

在扶余住了几天，大约是在12月中旬，曹里怀的部队开了过来，郭峰就是这个部队的政委，又是行署专员。这期间高万宝扎布、孙殿忠向曹司令他们汇报了郭前旗局势。

我们这才知道，郭前旗是蒙古族地区，斗争形势极为复杂。一方面，以伪旗长达木林多尔吉为首的一伙，勾结国民党长春党部要人，组织了郭前旗治安维持会，把伪满警备队改为治安队，委任伪警备队长陈达利为治安队长，到处招兵买马，扩大反动武装，现在已达700多人。另一方面，郭前旗蒙古族进步知识青年，在我地下党员刘健民同志指导下，成立了拥护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大同会。10月上旬在嫩江第一纵队夏尚志司令员帮助下，以大同会会员为骨干，建组成一支蒙古革命军，共200多人，与治安队形成了对峙局面。

曹司令和郭峰政委决定，把郭前旗蒙古革命军和治安队合编成蒙古骑兵独立团，让我去当政委。同时让田铁军到郭前旗任公安局长。郭峰看我有些为难情绪，就说：“你是蒙古通啊，一定要去！”我过去在呼和浩特、包头一带做过地下工作，但时间很短。我说：“那地方我谁也不认识，去训练改造蒙古兵，我怕难胜重任啊！”郭政委说：“有这么多的队伍做后盾，你怕什么。”我问：“给我配几名干部啊？”郭政委说：“一个也没有，就你一个人去，再说陈达利也不同意再去别的人，只同意去一个政委。”我又问：“去了以后怎么搞法？”郭政委说：“要讲民族政策，他们是蒙古族，我们部队都是汉人，否则会引起民族矛盾。你去了，一是要团结他们，二是要改造他们，最好不要动武力，要通过宣传教育把他们改造过来，也像咱们八路军一样，做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就这样，我接受了任务。

到了郭前旗，我和警卫员被安排在济生茂粮米店。住下后，便和高万宝扎布先去拜访陈达利，陈达利住在小老婆家。到陈家后，他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妻室和孩子，给我们端上了生鱼，我吃不下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2月8日正式宣布革命军、治安队合编为蒙古骑兵独立团，团长陈达利，我是政委，高万宝扎布任副政委，还有十几名干部战士。全团1000余人，下设三个营：一营驻王府站，二营驻新庙站，三营驻大老爷府。骑兵团组建后，集中了一段时间进行军政训练，然后投入了剿匪斗争。

战乱年代，富庶的大东北是匪患猖獗之地。土匪，在东北民间也叫“胡子”，多数枪法极准，几乎每个人都有一身绝技。土匪入绦子之后，个个都要苦练枪法，匪首经常举行各种枪法比武，以检验枪法，提高技艺。土匪凶狠残暴，烧杀抢夺，无恶不作，百姓们畏匪如虎。伪满洲国倒台后，这些土匪蜂拥而起，盘踞在东北不少的乡村和个别城镇，到处杀害我党干部，破坏交通，阻止我军北进和东进，为蒋介石的正面进攻，起到了战略上配合的作用。因此，我党决心先把土匪消灭干净，派几万名干部下乡搞土改，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为将来配合主力部队大反攻、夺取城市创造条件。

蒙古骑兵独立团隶属吉江军区，几次奉命剿匪都是我和陈达利带队去的。这些蒙古兵作战勇猛，善于骑射，土匪们一听说蒙古兵来了，就一溜烟地跑了。我当时想，这些蒙古兵真厉害，土匪这么怕他们，土匪一见蒙古兵追他们，连枪都不敢还就跑得无影无踪。

剿匪的时候，每当在村子里一住下，陈达利就没影了。我问战士：“你们看见陈团长哪里去了？”战士们回答：“这你还不知道？他抽大烟去了。”直到他抽完大烟，才回来张罗吃饭和休

息。

剿匪时住在老百姓家里，我和他们拉家常时问他们：“你们觉得这些蒙古兵怎么样？”老百姓说：“这些蒙古兵最不怎么样，他们打粳米、骂白面，打老太太吃鸡蛋。”这就是说，原治安队的纪律相当不好。了解到这个情况，我就在思考，对这个队伍的改造，直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但是，改造这支队伍也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蒙古骑兵团的指战员们都会说东北汉话。我只会说一两句蒙古语，什么“巴达依地”，即吃饭，什么“亚必亚”，即走。但是我一讲普通汉语，都能听懂。如果他们听不懂，还得找翻译，那可就麻烦了。通过几次剿匪，我知道了队伍的纪律情况，所以在每次讲话时都强调：“应该注意纪律，要学习八路军，要与农牧民搞好关系，不能打人家、骂人家，强要群众的东西。”渐渐地有的表现较好，但有的我行我素，不听约束。

1946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全然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呼声，公然破坏《停战协定》，疯狂地发动了全面内战。随着苏联红军撤离，国民党中央军5月22日占领长春，26日进占吉林，逐步控制了长春周围地区，并拉出北犯郭尔罗斯前旗的架势，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汉奸、地主、恶霸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局势，认为八路军终归打不过美国支持的国民党中央军。到处造谣惑众，暗杀我党干部。郭前旗及其周边地区潜伏的土匪，到处横行，国民党收拢的政治土匪不断进行骚扰，部分被八路军收编的地方武装也不断图谋叛变。随着东北战局的急剧变化，狡猾刁钻，采取“先八路，后中央；明八路，暗中央”伎俩的陈达利，以为时机已到，立即召开心腹会议，策划叛变。

我很快得知陈达利等人的阴谋活动，及时向吉江军区首长作了汇报。为了有效控制陈达利的叛变，吉江军区命令由沈启贤参

谋长率领一个步兵营和蒙古骑兵独立团去剿匪。我和陈达利率领蒙古骑兵团的三个骑兵连配合主力部队，先到乾安后到农安剿匪。陈达利认为到外地剿匪更有利于投奔中央军，因此加快了叛变步伐。骑兵连中的关兴武、陈万才（陈达利堂弟）、包福盛等鬼鬼祟祟，往来频繁。留守在王府、新庙的原治安队中的反动分子也都同陈达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暗中策划，伺机叛乱投敌。

我们打土匪走到乾安东部的一个屯子，天黑了，我们进了屯子，围子里的地主开枪打我们。我很感意外，就跟陈达利说：“这是怎么搞的，地主咋这么坏，干脆打吧！”陈达利说：“不能打，到前边那个屯子住去吧。”结果，一连走了几个屯子都是这样，都不让住。最后，天快亮时，我们走到农安地界的一个屯子，我说：“陈团长，沈参谋长他们住在这个屯子，咱们也住这吧。”他说：“好吧。”住下后，陈达利立刻在房上、墙下都布置了岗哨。我问：“你布岗哨作什么？”他说：“中央军冲上来把我们消灭了可不行，得防备啊。”我说：“前头都是我们的主力部队，他们过不来。”他说：“怕是过来呀。”我说：“好吧，那就布置吧，我先去沈参谋长那里汇报一下，请示我们这个团的下一步行动。”他说：“你去吧，你千万要跟他说，不能叫我们到前线去跟中央军打，咱们战斗力不行，打起来要吃亏的！”我随口说：“八路军不会叫咱们蒙古部队到前线去流血，如果沈参谋长让咱们去，我就跟他说，咱们不能去。”他忙不迭地说：“好、好、好！”

见了沈参谋长，我疑惑地问：“一路上地主老打我们，陈达利很惊慌，现在又在房上、墙下都放了哨，这是怎么回事？”沈参谋长微微一笑说：“陈达利是怕我们缴他的械，他怕的不是中央军，中央军怎么出得来呢？”

部队奉命返回郭前旗途中，经过小城子，这是陈达利的老家。一进屯子，就遇见几个穿长袍马褂的绅士，这几个人见了陈

达利，交头接耳的。当时我落后十几步远，不知他们说些什么。随后到了陈达利的家，也是一个围子。陈达利一进院，便在房上、墙下又都布置了岗哨。我说：“你在这地方还放哨作什么？这地方是大后方。”他说：“怕中央军来，把我们劫去咋办。”我估计，他是怕八路军来缴去他的武器。我没管他，同意他放哨。

住下后，我同陈达利住在一铺大炕上。我把枪放在炕上，他也把枪放在炕上。我躺在炕上休息，他却不休息，出来进去的，我就问他：“团长你咋不休息？”他说：“我们吃饭，还需要杀猪宰羊的，我得给他们安排安排。”我心里想，不对头，他们在这地方叛变对他们很有利，我必须立即采取应变措施。正当我思索对策时，陈达利带着几个警卫员闯进屋子。陈达利面含杀机地对我说：“黎政委，你不要害怕，我们蒙古人是心善的，不会杀你。”我立即意识到这是要叛变，肯定有人提出要杀掉我。这时我脑海里闪出第一次进内蒙大草原时遇到的惊心动魄的一幕。

那是1934年冬，党派我到内蒙，以税卡子开票员的身份，进行党的地下工作，暗地里和同志们一起组织了一支30多人的骑兵游击队。那时我才20岁，不懂得什么革命理论，只凭一股子革命热情，经常和战士在一起，指望能和他们建立起革命情谊，共同抗日。谁知这支队伍成分不纯，混进了坏人，不久就在反革命分子的唆使下叛变了。那天凌晨，我正在炕上睡觉，突然有人把我叫醒。我睁眼一看，冷冰冰的枪口已顶住了我的脑门，逼着我跟他们走。我义正词严地痛斥他们：“背叛革命，自绝于人民，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有人恼羞成怒，当即要开枪毙了我，幸亏一个平时和我个人感情比较好的人说了一句话：“要枪，要马，不要他的命吧！”这样，我才免遭杀害。每当想到这事，我就痛恨自己当时因为缺少革命理论，不善于斗争，给革命造成了损失。

这次是我第二次进草原，面对同样的情况，我坚信革命军，